

一李村

前人 后事

李村
前人后事

学人
随笔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前人后事/李村著.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015-6081-3

I. ①前… II. ①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15813号

策 划 人 银 星 雨 莲

责任编辑 李玉莲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张孜滢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88390636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10千字

印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5-6081-3

定 价 2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胡适在抗战初期的和战立场	003
胡适的名气和地位	008
胡适与梁启超	013
胡适到底是“诤友”还是“诤臣”	018
叶公超的后半生	024
说说顾颉刚	031
顾颉刚与傅斯年	035
鲁迅与顾颉刚	040
闻一多与朱自清	045
章太炎与刘师培	050
南北二陈	056
说“桌子的故事”	063
郁达夫与徐志摩	067
“才人佳人”的悲剧	073
滕固的《九日日记》	084
卢葆华其人其事	089
周作人与丰子恺	097
从“破门”到“谢本师”	101
也说“破门事件”	105
吴虞的女儿吴若膺	109
清末名士王闿运	115
晚年王闿运	121
黄潜与梁鸿志	128

清末的贪贿	138
民初的赌风	142
曾国藩是否想过当皇帝	146
中国人的“尊师重教”	150
文坛上的“美人计”	154
《小说时报》上的美人照	159
“孔乙己”上学	163
屈辱的身份	167
逝去的广和居	172
龙树寺与法源寺	176
历史不应当被美化	180
我看清华的民主	186
什么是“清华学派”	190
大学里的民主	195
“四喜丸子”与“马皇后”	200
抗战时期大学教授的婚姻变化	204
从黄侃说起	209
再说“私学”传统	213
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	218
说“诗钟”	222
闲话“五四大师”	226
胡适与“某籍某系”	230
民初教育界的浙派势力	234
周作人的文章	238
林语堂的“思满大人”	242
广陵散从此绝矣	246

前人后事 李村

——
林李 導引人前

胡适在抗战初期的和战立场

1937年7月14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告国民书》，宣示“抗战到底”之后，全面抗战正式展开。但是当时政、学两界，许多人对抗战的前途都抱着悲观态度，希望华北战事尽快平息，由冲突转向和谈。据说在庐山谈话会上，胡适的房间每天川流不息，是各方意见汇聚的中心。胡适的社会地位举足轻重，他的和、战立场自然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那么胡适的立场到底是什么，是主和还是主战呢？

后来有关胡适的研究论述，对这一问题大都语焉不详。例如吴相湘在《胡适传》里陈列了大量细节，但没有一句定见。而《胡适日记》这一段失记，也无从考察。一般认为，胡适的立场基本上是主战的，蒋介石决定让停驻河南边境的孙连仲部队开赴保定，就是接受了他和冯玉祥的建议。只是胡适认为，作战不影响和谈，“两国作战，一方面作战，一方面还是有交涉”，所以，他又将高宗武推荐给蒋介石，建议蒋介石“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

但是事实好像又并不如此。据罗君强《细说汪伪》，庐山谈话会结束后，胡适从牯岭下来，住在南京教育部大楼里时，经常与陈立夫、张伯苓、高宗武等人去周佛海家聚谈。这个“低调俱乐部”的名字不但是胡适起的，他自己也是“低调同志”中的一员。只是后来因为熊式辉（一说谷正伦）的提醒，胡适等人才收敛行迹，将和谈计划交由周佛海与高宗武、

陶希圣两人密谈，然后再由周佛海向汪精卫、陈布雷转达。而《王世杰日记》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王世杰在8月3日记：“二三日来，首都一般人士，均深感大战爆发后之危险。今日午后与胡适之先生谈，彼亦极端恐惧，并主张汪、蒋向日本做最后之和平呼吁，而以承认伪满洲国为议和之条件。”这天午后，王世杰又约胡适、吴达铨、周炳琳、蒋梦麟、罗家伦诸人在家里密谈。“胡、周、蒋均倾向于忍痛求和，意以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之前为之。”

可见胡适在抗战爆发后的立场，是主和而非主战的。只是他的主和立场有一套高深的理论，这就是“和比战难”。他这套“和比战难”的理论，前后有所变化，亦即有所充实有所发展。他最初的说法是，“只有强固的政府能忍辱，能接受屈辱的和平。”而像中国这样的弱国，没有求和的资格，也没有避战的条件。后来则发展为要达成和平，必须要依赖三个条件，一是要有敢于负责、致力于和平的调停人；二是弱国在接受调停时，必须为了求全之计，“承受相当大的牺牲”；三是调停人要有足够的实力，能够保证侵略国遵守承诺。简言之，必须有强有力的国家出来主持“公道”，而接受调停的国家必须付出绝大的代价，例如承认满洲国。但这样的避战和谈已经无异于投降卖国，对国家、民族的伤害程度，已经超过晚清时代的割地赔款。何况日本人提出的和谈条件，除了承认满洲国之外，还有内蒙自治、日本军队在内蒙永久驻兵、华北特殊化、蒋介石下野各项，接受这样的和谈条件当然“比战争更难百倍”了。只是既然如此，又怎样求和呢？

从这个角度去观察，在《胡适日记》中还可以找到许多证据。例如：1937年7月25日记：“我回到寓中，枚荪（周炳琳）来谈国事，正相向感慨，陈布雷也来了，我们长谈到六时才散。”结合前述的《王世杰日记》，他们感慨、长谈的内容可以想见。到了7月31日，因为第二天有蒋介石的约见，他事先去找高宗武，预备第二天的谈话内容。在高宗武家，

他又见到了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最后一起“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件事”：一是外交路线不能断绝，由高宗武负责打通路线，二是“时机迫切”，需要有人出来负此大任。但是第二天见蒋介石时，因为蒋介石首先“宣言决定抗战”，张伯苓又起来附和，他已经“不便说话”了，只有在告辞时向蒋介石建议，“外交路线不可断”，请蒋“寻高宗武一谈”。有了这一次的经验，8月6日蒋介石再约他谈话时，他便事先写了一封长函，“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他在这封长函里，对自己的和谈主张作了充分表达，建议蒋介石在大战之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他强调这样做的理由有三：“一，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二，日本财政有困难，有和平希望；三，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这三条里的前两条，显然是高宗武提供的意见。

从《胡适日记》还可以发现，他当时为了运动和谈，一度多方奔走，串联了许多人，不断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表达意见。从他日记中的口气看，他甚至宁愿像当年参加善后会议那样，冒天下之大不韪，出来“担负此大任”。他的这些活动在当时极度敏感的环境下，势必会“扰乱军心”，给刚刚开展的抗战局面造成消极影响。因此，蒋介石一开始对他还很客气，后来则渐生不满，在8月7日的国防会议上，便对胡适的和平论调加以谴责。据王世杰说，当时还有“若干军事将领”骂胡适是秦桧，现从《王世杰日记》看，他指的应该是程潜。另外在这次国防会议上，最高法院院长居正也站出来力主逮捕胡适，加以严惩。

当然，胡适的和谈立场，与汪精卫的“妥协作”不可同日而语。王世杰晚年曾替胡适证明，他建议蒋介石求和，完全是担心政府逞一时之忿，作孤注一掷的冒险，缺少长期抗战的准备。这是否是胡适的原议，可以不论，但他当时至少认为，“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他对国际社会也抱有信心，相

信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一定会加入亚洲战场，使战争形势发生根本性转变。因此，他在离开南京之前，曾劝汪精卫和高宗武“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在与陶希圣分手时，还说过“仗是打一个时期的好，不必再主和议，打了一个时期再说。”这是他的幼稚，也是他的远见。我想，蒋介石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知道胡适的和平主张，主要是为了立异鸣高，他的“和比战难”也是因为不情愿认错，替自己争面子而已。否则的话，他不可能派胡适去欧美作外交宣传，更不可能让他接任驻美大使。

但是胡适接任驻美大使后，还是没有改变和谈立场，与陶希圣、高宗武等人也继续保持着联系，想“以政治家的态度尽可能促成和平”；只是在“和比战难”之后，又加上了一句“苦撑待变”。1938年8月，他在致电蒋介石时又老调重弹，说“就目前形势论”，苏美两国不希望中国讲和的立场已经得到证实，“苏俄不愿我谈和，故以武器助我。美国不愿我溃败故愿经济助我。”以此证明他的“和比战难”，不但没有错，还很有远见。据张忠绂说，有一次，胡适在纽约外交协会演讲时，又再次提出“只要日本肯撤兵，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当时美国前国务卿史汀生也在场。事后在酒吧闲谈时，他用手扶在胡适的肩膀上，很诚恳地说：“你怎么能代替东北三千万人说这种话？”胡适一时无言。

胡适在美国的这类言论，当然会陆续传回国内。例如上海的《申报》、《译报》上都曾报道过他在纽约律师俱乐部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到广州、武汉陷落后，他曾向日本作过“非正式及间接之和平建议”，只是“日本所提条件，在中国万难接受”。《译报》还以这样的评语作为标题：“胡适谈中国抗战，竟谓中国向日本作和平建议，身为使节，竟做此谈话殊为失态。”并在这则消息的后面，写了一篇“小评”，题目是《胡适酒醉了么？》。据《王世杰日记》，1939年1月27日，冯玉祥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还根据一份“私人报告”，“指责胡适之在美言论之不当，并另有函致蒋先生，请其撤回胡适之”，解除其大使职务。

王世杰是胡适的密友，他知道这件事后，第二天一早立刻“致一书面于蒋先生”，替胡适做说明和辩解，“力言胡适近来态度极坚定，对于战事力主苦撑”，建议蒋介石对这件事作出调查。据说蒋介石经过调查，发现冯玉祥得到的私人报告是胡适的前任王正廷出于个人恩怨有意散布的。蒋介石了解真相后“甚为愤怒”，冯玉祥的提议也就不了了之了。不过，相信危机过去后，王世杰将这件事告诉过胡适。胡适后来在发言上能够有所收敛，应该与这件事有一定关系。

2009.6.6

胡适的名气和地位

记得一本有关胡适的论著中说，在民初社会一个人要获取名望，而且能够维持下去，必需要获得“边缘知识青年”的追随，由听众来决定立说者的兴衰。胡适早年“暴得大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此辈的拥戴”。但是在3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已经不再是先进的社会理论，胡适便在思想上落伍了，失去了这些追随者，地位开始下降。

这些话都说得很有道理。何炳棣说过一件事，1947年冯友兰去纽约时，何炳棣告诉他，有位清华同学写了篇关于胡适的硕士论文，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冯友兰听说后，急不可待地说，“这个题目很好，因为过了1927年，他就没得影响了。”冯友兰说话口吃，这些话也说得结结巴巴。冯友兰是胡适的同时代人，直接见证过这个事实。可以说在1930年以后，仅以思想的社会影响而论，胡适已经落到了冯友兰的后面。

不过我还是认为，这只说明了一部分事实。胡适在30年代以后，名气的确不如以前那么大了，但是他的社会影响力却从“边缘知识青年”那里，转移到了政、学两界的高层。从这个角度看，胡适的名望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扩大了。他在五四前后虽然名气很大，被人东接西请，听众如云，但是在政界和高级知识分子当中并没有实际的影响力。他的不少政治主张和学术见解，经常是被人嘲笑的对象，他对时局发表的意见，更被当

成了书生议政的笑话。何炳棣还提起过一件事，说当时邓之诚在燕京大学讲课，经常告诫学生：“同学们，千万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但是30年代以后就不一样了。举个例子来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牯岭召开谈话会，各路参会代表到了庐山，第一件事就去胡适的房间，听取他对时局的见解。这件事就足以说明问题。胡适在抗战前后，已经成了学界、教育界的意见领袖。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关键不在他的思想、学问，而在于他的人格。可以说从20年代后期开始，他早年的许多同事、学生都后来居上，成为政界、学界和教育界的重要人物，王世杰、朱家骅、蒋廷黻、罗家伦等人甚至进入了国民党的政治中枢，直接参与密勿，担任了极其重要的职务。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但在学问、地位上超过了他，政治见解更比他高明百倍。早在《努力周报》时代，汤尔和就曾颇有感触地告诉胡适，“从前我读你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们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但是尽管如此，这些人还是愿意以他为中心，建立一个小圈子，将他当做“老大哥”。即便与他关系并不很近的人，也喜欢说“我的朋友胡适之”。

我想，他们所以会这样，里面首先有一部分人情。从《新青年》开始，办报纸、办杂志一直是做官从政的终南捷径。而利用胡适的地位，经由《努力周报》、《独立评论》进入政界的，更不在少数。正如唐德刚所说，“他们与胡适的友谊关系，往往是他们搞政治的本钱。持胡适大旗而舞之”。但是除了这一点，还有胡适的人格。这又正如梁实秋所说，“胡先生的人品，比他的才学，更令人钦佩。”所以他们在很多问题上，明知胡适那一套是书生之见，还是愿意倾听他的意见，维护他的声誉。这样自己也向自己证明了：我从政以后，还是保持着书生本色，还是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例如王世杰早在河北问题上就劝胡适不要乱发言，“解决悬案”一类说法容易被人误解，当做亲日言论，但是在抗战爆发后，他明

知胡适与自己意见不同，到处唱“和比战难”一类的高调，仍然积极推动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当时的驻美大使王正廷是孔祥熙的亲信，他因为不愿离开这个位置，便通过孔祥熙的关系，一再以向美方贷款一事作为借口拖延此事，“苦撑待变”，王世杰发觉后，立刻以外交部长的身份电促王正廷“负责速了”，并且限定10月1日“为胡适之赴美递国书之期”。他还通过陈布雷，敦促蒋介石电致孔祥熙，大意谓“儒堂应毅然撤回，勿使再误国事；胡适之使美事，应于一星期内发表。”而当胡适在美国的言论遭人指责，有人提议撤换胡适的大使职务时，王世杰又立刻上书蒋介石，替胡适辩诬，使局面得以扭转。

至于傅斯年，更称得上胡适的保镖，在维护胡适的声誉上不遗余力。他公开宣称：别人都不配斥责胡适，要斥责胡适，只有他一个人有此资格。而他对于胡适根本就“从无贬抑之词”。抗战胜利后，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时，傅斯年在胡适接任之前，主动担任代理校长，替胡适处理“伪北大”遗留下来的棘手问题，甘愿去做得罪人的角色，对胡适的体贴真是无微不至。我最近从《朱自清日记》上还多次看到，抗战期间，他与胡适的关系已然疏远了，但每当有人“指责胡先生”，他都会站起来反驳。可见胡适在人品上的确有过人之处。唐德刚说胡适的老朋友“学而优则仕后”，“都一去不返了”，显然不是事实。

正是因为这样，蒋介石从1933年以后，一直有意拉拢胡适，经常就国是问题征求他的意见；明知胡适书生议政，不切实际，只不过是夸强道会而已，还是耐心听取，待以“帝王师”的礼遇。他还一再敦请胡适不但要坐而言，还要起而行，出来担任政府要职，甚至希望胡适出任行政院长，并承诺只要胡适同意，所有政务委员和部会首长的名单都任由他决定，自己绝不干涉。即便在败走台湾后，胡适每次来往于美国和台湾，蒋介石都会派蒋经国去机场迎接，还无一例外地约胡适单独见面，一同进餐。1952年底胡适回台湾时，蒋介石还邀请他陪同自己一起检阅军队。民国以来，

天下滔滔，士大夫获此殊荣者，也只有胡适一人而已。这让胡适感慨地说：“总统对我太好了。”

蒋介石作为政治家，当然知道以胡适在学界的地位，如果能接受政府职务，不但可以美化政府的形象，还可以扩大国民党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特别是抗战爆发前后，许多大学教授接受征召，参与到政府工作。例如北大的陈大齐、樊际昌、吴俊升、吴景超、叶公超；清华的蒋廷黻、顾毓琇、浦薛凤、王化成、陈之迈；燕京的徐淑希、吴其玉；南开的何廉、李卓敏、崔书琴；武大的张忠绂、陈源，罗列下去，还可以有长长的一串。国防最高委员会初成立时，甚至参事室的所有参事都来自大学教授，其中清华教授占大多数。他们应召从政后，普遍以清流自居，认为“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在国民党各派系之外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群体。虽然平时各自为政，缺乏组织上的联系，在实力上无法与CC派、政学系相较，但是在政府以外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所以他们加入政府后，固然提高了政府的威信，改善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但也成了体制内的一种隐患。而胡适与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有私交，有很深的渊源和联系，如果胡适能够担任政府要职，以他一向的亲合力，显然会帮助政府消弭隐患，巩固政府与“学者派”之间的关系。只是蒋介石的这番愿望，后来一直未能实现。

因为胡适明白，他的特殊地位，完全是建立在与政府若即若离的关系上。一旦这种关系改变了，他就不再是“民意的代表”，失去作为意见领袖的身份。所以他在多数场合下都很会掌握自己的身份，出处近于化境。这正如陶希圣说，胡适“在任何一个场合，一举一动，都能恰好适应这个场合，无论是说话，或是谈话，总有不失自己立场而又适应这个场合的一番意义。”据说他同意出任驻美大使，完全是因为王世杰和傅斯年向他晓以大义，一再苦求的结果，所以他卸任后便向蒋介石表示，以后要“重理教业，专力教学著述，以报国家”。为了不再接任政府职务，他还继续

留在美国担任临时教职。他这种心情，在给江冬秀的信里讲得最清楚，他说“我当然盼望回去，但我不要做（中央研究院）院长，我的意见同你一样，我若回去，还是到昆明北大教书。别的事一概不做。”他怕蒋介石不理解这一点，曾经多次向蒋介石表示，以他的地位，最好还是站在政府的外边，“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他还教导蒋介石，应该“有诤臣一百人，最好是一千人”，这样国家就强大了。其实像他这样的诤臣只能有一个，这又证明了他的幼稚。据说，蒋介石还向他表示，如果他执意要做“诤友”，也可以出来组党，或者办一个政论性杂志，胡适也都没有同意。他曾就这件事对人说过，他过去办《独立评论》的时候，每期的费用是和丁文江、傅斯年等人共同负担的，现在物价飞涨，米珠薪桂，个人哪里还有这样的财力？如果去政府那里要钱，那就不可能再做政府的“诤友”，客观地发表意见了。

不过，胡适毕竟不是圣人。他可以拒绝做政务委员，拒绝做大使，甚至拒绝做行政院长，但不一定会拒绝做总统。1948年首届国民大会时，蒋介石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假意向胡适表示，他要將总统位置让给胡适，自己担任行政院长，正准备在国民党中央执会上推荐他做总统候选人。胡适竟然信以为真，认为蒋介石“很诚恳”，自己“能做总统是很光荣的事（陈立夫语）”，同王世杰、周鲠生反复商量后，欣然接受了，结果为一生留下了污点。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彻底崩溃之前，他还对司徒雷登说，他很后悔自己在抗战结束后一直埋头于《水经注》，“而未在思想战场上努力”，以致“边缘知识青年”失去了思想上的指导，使“共产主义横行”，说完后，两人相对啜泣，这就更可笑。但这就是胡适。

2009.2.9